

摩洛哥政教关系与宗教治理探析*

◎ 黄麟

内容提要: 摩洛哥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传统君主制、圣裔血统和作为“信士之长官”的宗教权威共同构成国王合法性的基础。历史上,摩洛哥宗教权力由素丹、苏非教团和乌里玛共享,竞争与融合是其传统政教关系的主要特点。现当代以来,国王的宗教权威经历了神魅化和法理化演进,王室逐步垄断了宗教权力。20世纪80年代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相继对王室的宗教权威发起挑战,但国王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予以化解。制度化正义与发展党、边缘化正义与善行会、配合国际“反恐战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倡导苏非派的忠诚与温和价值,以及鼓励“温和伊斯兰”以确保“精神安全”和国家安全,是穆罕默德六世进行宗教治理的主要方法与核心内涵。

关键词: 摩洛哥 政教关系 宗教治理

作者简介: 黄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

政治与宗教的交织是摩洛哥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持续主题,在考虑到国王权威的二元性时更是如此。一方面,国王及其赞助的中央权力机构垄断了国家权力,具有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国王作为等同于哈里发地位的“信士之长官”履行宗教职能,从而集神圣与世俗权力于一身。国家的座右铭“真主、祖国和国王”(Allāh, al-Waṭan, al-Malik)象征着宗教与政治的融合。^①然而,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摩洛哥政治与宗教既相互交织,又彼此竞争,二者处于一种竞争性共存状态。现当代以来,由于宗教权威的神魅化和法理化演进,王室逐步垄断宗教权力,但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对王室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穆罕默德六世采取一系列宗教领域的改革,强化了政府对宗教的控制,进而稳固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维持了平衡稳定的政治秩序。本文通过长时段历史视角爬梳摩洛哥政教关系的演进,在此基础上对当代摩洛哥的宗教治理予以析评。

一、摩洛哥政教关系的历史考察

681年,伍麦叶王朝将领奥克巴·伊本·纳菲(Uqba Ibn Nafi)西征,开启了伊斯兰教在摩洛哥的历史。788年,什叶派伊玛目哈桑的后裔伊德里斯·本·阿卜杜拉(Idris Ibn Abdullah)建立摩洛哥历史上首个统一王朝——伊德里斯王朝。伊德里斯人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并设置一种谏议组织,奠定了后来被称为“麦赫赞”(makhzen)的雏形。^②859年,来自凯鲁万的政治和宗教反对派法蒂玛·穆罕默德·法哈里(Fatima Muhammad al-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东剧变以来北非政治伊斯兰发展研究”(编号:22CZJ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研究”(编号:20JJD730001)、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东变局以来政治伊斯兰的发展对中国中东外交战略影响研究”(编号:22JT043)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苏珊·吉尔森·米勒:《摩洛哥史》,刘云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33页。

② “麦赫赞”(makhzen),原意为管理财政税收的官方机构,即“司库”。麦赫赞一方面向素丹控制的地区征税,另一方面为公务人员支付薪资。基于这一财政功能,麦赫赞逐渐演变为国家的同义词或代名词。后作为一种古典政治制度延续下来,代表围绕王室形成的政治-宗教-军事精英集团。

Fahari) 在非斯建立凯鲁万清真寺,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凯鲁万大学成为著名伊斯兰高等学府。自建立以来, 非斯和凯鲁万清真寺一直是城市乌里玛 (*ulama*) 的荟萃之地, 乌里玛在宗教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尽管之后各朝代在梅克内斯、马拉喀什和拉巴特建立了政治首都, 但非斯一直是摩洛哥的精神文化中心, 这与凯鲁万清真寺以及围绕其形成的乌里玛阶层的存在息息相关。^①

1061年, 柏柏尔人领袖优素福·伊本·塔什芬 (Yūsuf Ibn Tāshfīn) 建立穆拉比特王朝 (Almoravid), 伊本·塔什芬自称“埃米尔” (*Amir al-Mu'minin*), 即“信士之长官”, 将这一类似于哈里发的称谓引入摩洛哥政治。^② 穆拉比特王朝统治者集政治和宗教权力于一身, 在宗教上, 推崇逊尼派的马立克教法学派, 各清真寺教长和法官均由马立克学派学者担任, 教法学者经埃米尔核准发布教令 (*fatwa*)。马立克学派自此成为摩洛哥伊斯兰教的支柱之一。12世纪初, 伊斯兰教神学家穆罕默德·伊本·图马特 (Muhammad Ibn Tumart) 发起了一场宗教政治运动, 最终推翻穆拉比特王朝, 建立穆瓦希德王朝 (Almohad)。^③ 穆瓦希德王朝统治者同样号称哈里发和“信士之长官”, 意在宣示其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双重权威。历经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两朝后, 摩洛哥政教关系中君主权权威的二元性已基本定型。

1666年, 阿拉维人建立了延续至今的阿拉维王朝。阿拉维人自称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的后裔, 阿拉维王室名称中的“谢里夫” (*sharif*) 即是圣裔血统的标志。圣裔血统、传统君主制和作为“信士之长官”的宗教权威共同构成阿拉维王室合法性的基础。王室的合法性通过定期的效忠 (*bay'a*) 仪式获得确证, 每年3月3日, 各级行政官员和各地乡绅代表向阿拉维王室宣誓效忠, 以示对王室作为政治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之双重地位的认可。^④ 在这种政治话语下, 阿拉维王室的统治具有一种神圣色彩。

但在前殖民时代, 摩洛哥君主从未绝对控制宗教的解释权,^⑤ 宗教权力被处于统治地位的素丹、遍布各地的苏非教团以及乌里玛所共享。^⑥ 尽管这三大机构之间有时处于相互竞争甚至敌对状态, 但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获得宗教领域的绝对控制权。^⑦ 作为“信士之长官”, 素丹享有特殊宗教和政治地位, 这使其能够通过呼吁宗教来动员大众。苏非教团以传道为主, 远离政治, 但也有部分教团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填补政府在边缘地区的职能空缺, 从事地方管理和经济贸易等事务, 因此在乡村民间享有一定的宗教、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为平衡苏非教团的影响力, 素丹会支持凯鲁万清真寺和主要宗教机构的乌里玛发展学术事业, 以扩大乌里玛在民间的影响, 但乌里玛的影响力往往仅限于城镇地区。19世纪末, 受阿富汗尼和

① Annelle Sheline, “Royal Religious Authority: Morocco’s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Research Paper,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March 31, 2019, <https://doi.org/10.25613/cwwe-ht13>. (阅读时间: 2023年12月2日)

② [突尼斯]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 李振中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 第317—323页。

③ 关于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历史, 可参见 Amira K. Bennison, *The Almoravid and Almohad Empir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④ Jamal Benomar, “The Monarchy, the Islamist Movement and Religious Discourse in Morocco,”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2, Apr. 1988, pp.551–552.

⑤ Malika Zeghal, *Islamism in Morocco: Religion, Authoritarianism, and Electoral Politics*,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2008, pp. xiv–xv.

⑥ Emad Eldin Shahin, *Political Ascent: Contemporary Islamic Movements in North Af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98, pp. 20–21.

⑦ Jamal Benomar, “The Monarchy, the Islamist Movement and Religious Discourse in Morocco,”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2, April 1988, p. 544.

穆罕默德·阿布杜伊斯兰现代主义影响，一些曾受教于凯鲁万清真寺的乌里玛开始鼓吹萨拉菲思想和伊斯兰改良思潮，其中包括阿拉比·阿拉维（al-Arabi al-Alawi），其思想直接影响了摩洛哥民族主义领袖穆罕默德·阿拉勒·法西（Muhammad Allal al-Fassi）。^① 在法西的领导下，乌里玛在日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将部分地塑造现当代摩洛哥的政教关系。

二、现当代摩洛哥政教关系的演进

直到20世纪初，当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不断渗透摩洛哥，进而实行保护统治时，摩洛哥宗教内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摩政教关系得以重塑。由于在保护统治时期的亲法立场，建国之初苏非派逐渐被政府边缘化。同时，具有改良思潮的乌里玛虽然领导了民族主义运动，但不断分化与削弱，最终被纳入官方宗教体制。反观素丹，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努力和遭遇，使得素丹和王室逐渐成为摩洛哥国家统一的象征。作为“国父”，穆罕默德五世将个人魅力融入宗教权威之中，其后哈桑二世对宗教权威进行法理化，使国王的合法性兼具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特征，以至于到穆罕默德六世时代，王室基本垄断了国家宗教权力。但是，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对王室的合法性构成挑战。

（一）穆罕默德五世与宗教权威的神魅化

保护统治时期，丧失独立主权的摩洛哥遭到殖民掠夺和强制性同化，素丹的权威急剧衰弱。由于未能抵御欧洲列强的入侵，素丹受到大众的非议和不满，尤其受到来自苏非教团和乌里玛的施压。当时，大多数苏非教团或出于个人恩怨或由于被乌里玛集团排斥而站在法国殖民当局一边；^② 受萨拉菲改良思潮影响的乌里玛则采取对内批判苏非、对外反对殖民的立场，进而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旗手；^③ 而素丹只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仅保留了作为第一伊玛目的宗教地位和象征性权力，国家实权掌握在法国当局总督兼殖民军司令利奥泰手中，其在摩洛哥实行素丹授权下的“间接统治”。随着保护统治的深化，素丹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每下愈况。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穆罕默德五世开始与民族主义者联盟，共同推进民族独立事业。1947年4月9日，穆罕默德五世在丹吉尔发表历史性演说，首次公开提出摩洛哥独立的诉求，正式加入反对保护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行列。素丹的行为鼓舞了独立党和普通民众的斗争热情，因此掀起了一股“君主热”，素丹逐渐成为被崇拜的国家象征。1951年初，法国殖民当局对摩洛哥民族独立运动进行强力镇压，但穆罕默德五世拒绝在镇压独立党的诏令上盖章，招致殖民当局的不满，后者遂密谋将其废黜。1953年8月20日，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指使下，时任马拉喀什帕夏的泰米·格拉维发动政变，废黜穆罕默德五世，王室成员被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素丹的废黜和王室的流放使得抽象的民族主义事业同王室的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因而变得具体化。这加强了摩洛哥民众对素丹和王室命运的同情，同时也激化了对保护国当局的抗议浪潮，民族主义者甚至参与暴力示威，要求素丹复位。1955年11月5日，法国迫于形势压力宣布恢复穆罕默德五世的王位。

穆罕默德五世被迫流亡，表明素丹为争取独立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以及其作为传统、

① Emad Eldin Shahin, *Political Ascent: Contemporary Islamic Movements in North Af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98, pp. 32-34.

② Rachida Chih, "Sufism,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orocco," *Journal for Islamic Studies*, Vol. 32, 2013, p. 36.

③ [美] 苏珊·吉尔森·米勒:《摩洛哥史》，刘云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85页。

宗教和现代主权的象征意义，这使得素丹凌驾于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之上。这是法国允许素丹回国并在讨论独立事宜时将其作为主要对话者的主要原因，也是独立后君主制得以存续的原因之一。穆罕默德五世在反殖民运动的努力和遭遇，使得素丹和王室逐渐成为摩洛哥国家统一的象征。经历反殖民斗争后，穆罕默德五世将个人魅力融入宗教权威之中，成为摩洛哥“国父”。^①

（二）哈桑二世对宗教权威的法理化

哈桑二世继位后，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和国王作为“信士之长官”的条款写入宪法，进而对宗教权威进行法理化。为了从法律上确立君主的权威，哈桑二世于1962年12月颁布摩洛哥首部宪法。宪法规定，摩洛哥是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是国教，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宪法》第19条规定，国王是“信士之长官”和“国家的最高代表”。此外，国王还是皇家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同时有权任命首相和内阁大臣，有权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和解散议会等。^② 这样，宪法赋予国王“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地位，加强了他作为国家元首而拥有的近乎没有限制的行政权力”。^③ 与此同时，宪法规定实行多党制和两院制议会，这使得摩洛哥政治进入威权和多个政党共存的二元模式。

哈桑二世在位期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宗教话语权被王室垄断，其余宗教领袖只能扮演有限的从属角色。但部分乌里玛也对王室的权力世袭和滥权行为进行批判。毛拉阿拉比·阿拉维曾发布教令批评世袭统治，他主张，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应该由穆斯林乌玛（*Ummah*）通过协商（*Shura*）方式来选举和任命。^④ 但在1963年之后，各种异议和反对声逐渐被压制。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哈桑二世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其统治很快遭到来自军队亲信的反噬。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发生了两起针对哈桑二世的政变。^⑤ 虽然两次政变均以失败告终，但造成了国王的合法性危机。这迫使哈桑二世重新审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改革措施，包括与保守伊斯兰团体结成“神圣联盟”，使伊斯兰势力成为抗衡世俗化的军事上层和各政党的政治力量，为此国王在政府内外加强了宗教人士的地位。事实证明，“神圣联盟”的结成的确平衡了各政党的势力，尤其弱化了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为代表的左翼势力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催生了现代政治伊斯兰的兴起，而这对国王和阿拉维君主制构成了新的挑战。

（三）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与挑战

摩洛哥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在大学校园。1969年，阿布杜·卡里姆·穆蒂（Abd al-Karim Mouti）创建“摩洛哥伊斯兰青年”（*al-Shabiba al-Islamiyya*）组织。70年代初，为限制左翼势力的影响，哈桑二世开始重视阿拉伯语教育，鼓励伊斯兰教研究，并于1973年在大学里以伊斯兰研究系代替哲学系。在1972至1975年间，伊斯兰青年组织填补了全国学生联合会被官方镇压后留下的政治空间，成为大学校园里

① 1957年8月14日，穆罕默德五世将国名改为“摩洛哥王国”，素丹改称国王。本文以下称摩洛哥君主为国王。

② Leveau, Rémy. “The Moroccan Monarchy: A Political System in Quest of a New Equilibrium,” In *Middle East Monarchies: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edited by Joseph Kostin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0.

③ [美] 苏珊·吉尔森·米勒：《摩洛哥史》，刘云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03页。

④ Jamal Benomar, “The Monarchy, the Islamist Movement and Religious Discourse in Morocco,”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2, April 1988, pp. 549-550.

⑤ 关于两次政变的详情，参见 John Waterbury, “The Coup Manqué,” *Fieldstaff Reports : Africa : North Africa Series*, Vol. 15, No. 1, pp. 398-409; Stephone O. Hughes, *Morocco under King Hassan*, New York: Ithaca Press, 2001, pp. 159-166.

的主导力量，扮演着制衡左翼势力的重要政治角色。^① 1975年，由于涉嫌参与工人领袖奥马尔·本杰隆（Omar Benjelloun）谋杀案，该组织被取缔。

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北非风起云涌。1981年，穆蒂创办《圣战者》杂志，公开反对哈桑二世政权，这直接导致该组织的分化和重组，其中阿卜杜拉·本基兰（Abdelilah Benkirane）领导的分离派脱离原组织，成立“伊斯兰社团组织”（*al-Jama'a al-Islamiyya*）。本基兰摒弃了穆蒂的激进主义立场，表示将在合法框架内进行伊斯兰宣教事业。自1983年成立以来，伊斯兰社团组织一直未获得合法认定。直到1996年，本基兰放弃“伊斯兰”号召，改称“统一与改革运动”（Movement of Unity and Renewal），后获准以联合政党的方式参政。在准许参政之前，本基兰及其组织成员被要求遵守以下规则：“承认‘信士之长官’的概念、放弃暴力、承认马立克教法学派、承认摩洛哥领土完整的合法性。”^② 总之，要承认君主的合法性，以及由哈桑二世定义的国家信条的主要内容。随后，本基兰率其组织成员加入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人民民主宪政运动”，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9个席位，开始涉足摩洛哥政坛。1998年，本基兰将自己的政党更名为“正义与发展党”（PJD），成为当代摩洛哥重要政党。

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伊斯兰组织是阿卜杜·萨拉姆·亚辛（Abdessalam Yassine）建立的“正义与善行会”（AWI）。正义与善行会是一个糅合了伊斯兰主义、苏非主义和非暴力一民粹主义思想的社会组织，其发展轨迹始终与亚辛个人的思想和命运息息相关。初期，该组织几乎等同于一个围绕谢赫亚辛建立的有苏非倾向的社团组织，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发展模式主要以宣传亚辛个人的书籍和思想为主。亚辛将20世纪70年代初摩洛哥的社会政治问题归咎于君主制，并大胆攻击国王本人。1974年，亚辛向哈桑二世发表了一封名为《伊斯兰或洪水》（*Islam or the Deluge*）的公开信，信中称呼国王为“兄弟”而非“长官”，并劝诫他修正自己的道路，改变以往的腐败作风。^③ 但最重要的是他公开质疑国王作为圣裔的宗教合法性。由于提出“君主不是国家宗教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一颠覆性主张，亚辛被关入精神病院，后长期处于软禁状态。^④ 1990年，哈桑二世下令取缔该组织，限制其成员开展和参与一切社会活动，但民众对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热情并未就此衰减，甚至对一些伊斯兰组织的话语充满宗教狂热。这使国王不得不调整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态度。90年代，哈桑二世采取了新策略：只要温和伊斯兰政党不对君主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和挑战，就将其纳入政治领域之内。^⑤ 之后，摩洛哥涌现出很多伊斯兰组织与政党。

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重构了摩洛哥的宗教生态，新生的伊斯兰政党组织运用宗教象征和符号进行动员，宗教领域不再由自上而下的权力话语所主导。新宗教代言人的出现争夺了王室宗教话语的支持者，建国以来国王处于一尊的权力地位受到挑战，即使君主制的根基并没有被动摇，但传统上王室的宗教合法性受到削弱。在此意义上，摩洛哥宗教结构的变迁重塑了其政治生态。在新的政治情境下，以宗教合法性为核心的政教关系和宗教治理问题，成为穆罕默德六世面临的主要考验之一。

① Henry Munson, *Religion and Power in Morocc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0.

② Malika Zeghal, *Islamism in Morocco: Religion, Authoritarianism, and Electoral Politics*,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2008, p. 178.

③ Roxanne L.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en Lad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03.

④ Vish Sakthivel, *al-Adl wal-Ihsan: Inside Morocco's Islamist Challeng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14, p. 5.

⑤ Pierre Vermeren, *Histoire du Maroc depuis l'indépendanc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2, pp. 95-97. 转引自：[美] 苏珊·吉尔森·米勒：《摩洛哥史》，刘云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36页。

三、穆罕默德六世的宗教治理策略

穆罕默德六世上台后定下与过去果断决裂的基调，承诺加快政治现代化改革。但这一进程受到“9·11”事件和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案的冲击和阻碍。2003年之后，摩洛哥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应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威胁。纵观穆罕默德六世二十余年的统治，在应对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威胁、处理与伊斯兰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行宗教治理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策略：（一）制度化正义与发展党；（二）边缘化正义与善行会；（三）配合国际“反恐战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四）倡导苏非派的忠诚与温和价值。与此同时，鼓励“温和伊斯兰”以确保“精神安全”和国家安全，是穆罕默德六世进行宗教治理的主要目标与核心内涵。

（一）制度化正义与发展党

1999年初，摩洛哥内政部正式对正义与发展党予以合法认定。自此，正义与发展党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进行运作。从1969年摩洛哥伊斯兰青年组织成立到1999年正义与发展党获得合法认定，在整整30年寻求合法化之路背后，是围绕政治合法性和宗教话语权的竞争和博弈。正义与发展党获得合法认定是建立在该党与国王政治利益互惠的基础之上。作为庇护者，国王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军事权力以及经济资源，为正义与发展党提供政治庇护，支持其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并开展政治活动。作为被庇护者，正义与发展党必须以认可王室的合法性、服从国王的领导作为回报。换句话说，阿拉维王室通过合法化正义与发展党来换取对自己合法性的支持，^①同时树立了摩洛哥政治的民主形象。

2011年11月议会选举，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第一大党，党主席本基兰任首相。尽管摩洛哥实行多党制和议会选举，但国家的行政、立法、军事和宗教大权都掌握在国王手中。国王依赖两大支柱行使权力：一是历史上形成的国王作为政教合一国家领袖的神圣地位；二是传统上围绕王室形成的政治-宗教-军事精英集团。^②在多党制议会政治中，国王扶持亲王室的精英组成政党，由这样的政党通过选举组阁执政。^③因此，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实际上取决于王室的支持力度。2016年议会选举，正义与发展党再次胜选，但在组阁过程中遭到王室和其他政党的重重阻碍。经历五个月的僵局后，穆罕默德六世罢免本基兰，任命萨阿德丁·奥斯曼尼为新首相。2021年议会选举，主政十年之久的正义与发展党彻底失利。因此，即使正义与发展党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议会最大党，但由于缺少政治实权，其往往难以兑现在民选过程中作出的政治承诺，这是导致其失利的主要原因。

（二）边缘化正义与善行会

哈桑二世统治时期，由于正义与善行会精神领袖亚辛的反动言论，该组织长期游离于合法政党之外，并受到打压和限制，亚辛本人长期处于国王的监视和软禁之下。虽然一直未获官方的合法认定，但该组织是摩洛哥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它所开展的社会服务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缺失，因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1999年穆罕默德六世上台后，将亚辛释放，并对正义与善行会的存在予以容忍，只要其弱化质疑王室合法性的论调，国王便会因该组织的社会贡献默许其在民间运作。穆罕默德六世通过适度容忍一个类似于公民社会组织存在，一方面确保了其在名义上作为自由化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弥补了政府政策

① Amina Drhimeur, *The Part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s Pragmatic Politics*,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Issue Brief, 05.31.2018, p. 2.

② Mohamed Daadaoui, *Moroccan Monarchy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Maintaining Makhzen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41-70.

③ 吴冰冰：《摩洛哥的渐进式改革能成功吗？》，《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日。

在部分偏远地区的漏洞，而正义与善行会的社会服务恰恰保障了这一点。2012年亚辛去世后，正义与善行会逐渐被摩洛哥政府边缘化。在“2·20运动”中，该组织最初加入游行示威行列，并且视之为动摇君主体制、实现国家伊斯兰化的重要时机，但随着这场运动以国王自主的宪法改革收场，同时由于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脱颖而出，使得正义与善行会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组织动员力量受到削弱，^①后者遂选择退居幕后。正义与善行会至今仍是摩洛哥最重要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但政府通过宗教、政治和武力镇压的手段削弱了其带来的潜在威胁。

（三）配合国际“反恐战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2003年5月16日，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发生3起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45人死亡，多人受伤。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对摩洛哥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使其更深地卷入日益增长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之中。为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和冲击，穆罕默德六世采取国内治理和外交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基本消除了摩洛哥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

在国内治理方面，穆罕默德六世启动了一系列宗教领域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措施：第一，加强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包括重组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Endowments and Islamic Affairs）和最高乌里玛理事会（Supreme Council of Ulema）等重要宗教机构，强化各机构的功能和职责；^②设立全国唯一的教令委员会（*Ifta* Committee），统一发布重要法特瓦，避免因教法分歧损害国家利益。第二，提高摩洛哥宗教教育的现代化，包括实施针对伊玛目和训导师的培训和教育计划，由官方统一遴选、培训和指派宗教神职人员；改革宗教课程，涵盖心理学、哲学、比较宗教学和外语，使之更具多样化，以促进开放和温和的思想；^③重视妇女在宣教中的角色和地位，启动“女性训导师计划”（*Mourchidat Program*），将女性及其提供的家庭教育和正向宗教引导，作为保障“精神安全”的重要防线。^④第三，着力打造并宣传官方伊斯兰教，以促进宗教的温和化。2005年，摩洛哥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联合推出阿萨蒂萨（Assadissa）电视台，致力于宣传政府倡导的官方伊斯兰教。^⑤

在外交合作方面，摩洛哥与美国建立反恐同盟，配合国际“反恐战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国际“反恐战争”，穆罕默德六世成为支持美国反恐行动的“第一个朋友”。^⑥2001年，摩洛哥安全部队发现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圣战萨拉菲”组织成员，随后进行了严密搜捕和查获，将数以千计的激进分子投入监狱。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发生后，摩洛哥发起了一场严厉镇压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战役，其势头从2003年开始持续不减，这场战役由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哈米杜·拉阿尼格利（Hamidou Laanigri）将军亲自领导进行。鉴于“圣战萨拉菲”对摩洛哥国家安全的威胁，摩洛哥政府对萨拉菲组织进行持续镇压。在政府的强力打压下，萨拉菲主义在摩洛哥社会的生存空间极度萎缩。通

① Vish Sakthivel, *al-Adl wal-Ihsan: Inside Morocco's Islamist Challeng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14, p.23.

② 张玉友：《摩洛哥反极端主义政策评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

③ Assia Bensalah Alaoui, "Morocco's Security Strategy: Preventing 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Extremism," *European View*, Vol. 16, No. 1, December 2017, p. 109.

④ Samantha Harrington, Women provide "spiritual security" in Morocco, December 12, 2013, <https://news.trust.org/item/20131212010325-jkva6/>. (阅读时间：2023年12月2日)

⑤ Ann Wainscott, *Bureaucratizing Islam: Morocco and the War on Terr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26.

⑥ John Damis, *US-Arab Relations: The Moroccan Dimens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on U.S-Arab Relations, 1986, pp. 1-35.

过以上改革措施，摩政府净化了国内的宗教环境，有效抵制了宗教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四）倡导苏非派的忠诚与温和价值

2003年之后，摩洛哥政府加强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并着力打造摩洛哥化的官方伊斯兰教，以促进宗教的温和化。苏非派则以其亲国王的立场和较为温和的教义受到政府青睐。^① 2004年，穆罕默德六世将摩洛哥伊斯兰教的四大支柱定义为：马立克教法学派、艾什尔里教义学派、国王作为“信士之长官”的身份以及苏非派，将苏非派作为官方宗教认同的重要一环。同年，在马拉喀什举行的苏非大会上，穆罕默德六世致祝贺信，鼓励用苏非派信仰取代激进主义思想。^② 由于与鼓吹真主主权、实行教法治国的政治萨拉菲不同，苏非教义倡导守贫、苦修、禁欲和净化思想，历史上大多数苏非教团持远离政治、不问世事的态度，并形成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形象。因此，穆罕默德六世试图“恢复苏非主义在传播温和的伊斯兰价值观、爱与和谐方面的作用，同时实现其净化灵魂、铲除狂热和仇恨的职能”。^③ 穆罕默德六世倡导苏非价值的目的在于鼓励“温和伊斯兰”的构建，以确保国家的“精神安全”与国家安全。在国王和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摩洛哥苏非派成为遏制极端思想和救治人心的良方，在当代获得新的发展。

四、结论

摩洛哥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伊德里斯王朝将宗教与政治融为一体建立了“麦赫赞”的雏形，穆拉比特王朝开国君主伊本·塔什芬将“信士之长官”概念引入摩洛哥政治。历经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两朝后，摩洛哥政教关系中君主权威的二元性已基本定型。阿拉维王朝建立后，将作为谢里夫的圣裔血统加入宗教权威之中，使得传统君主制、圣裔血统和作为“信士之长官”的宗教权威共同构成国王合法性的基础。在前殖民时代，虽然素丹处于主导地位，但他从未垄断宗教的解释权，宗教权力由素丹、苏非教团和乌里玛共享，三者处于竞争性共存状态。现当代以来，穆罕默德五世将个人魅力融入宗教权威之中，其后哈桑二世对宗教权威进行法理化，使国王的合法性兼具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特征，以至于到穆罕默德六世时代，王室基本上垄断了国家宗教权力。20世纪80年代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相继对王室的宗教权威发起挑战，但国王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予以化解。制度化正义与发展党、边缘化正义与善行会、配合国际“反恐战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倡导苏非派的忠诚与温和价值，以及鼓励“温和伊斯兰”以确保“精神安全”和国家安全，是穆罕默德六世进行宗教治理的主要方法与核心内涵。

（责任编辑 王伟）

① 林友堂：《摩洛哥苏非派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Fatima Ghoulaiichi, *Of Saints and Sharifian Kings in Morocco: Three Examples of the Politics of Reimagining History Through Reinventing King/Saint Relationship*,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05, p. 41.

③ King Mohammed VI, "Royal Message to Participants in Third Gathering of Followers of Tariqa Tijania in Fez," Kingdom of Morocco, <https://www.maroc.ma/en/royal-speeches/royal-message-participants-third-gathering-followers-tariqa-tijania-fez> (阅读时间：2023年11月29日)